

过渡期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概览*

——以雅各布森与巴赫金的研究为代表

陈 勇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北京 100089 / 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 河南 洛阳 471003)

摘 要: 在俄罗斯符号学发展的理论准备期、发展期、成型期、过渡期、成熟期和后洛特曼时期等 6 个主要阶段中, 过渡期以雅各布森和巴赫金的研究为代表。两人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符号学大家, 分别与俄罗斯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直接相关, 在很大程度上分别反映了莫斯科的语言学研究传统和彼得堡的文学研究传统, 对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均有直接的影响。雅各布森的符号分类思想、符号学定位思想、语言符号学理论对一般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巴赫金有关符号性质、话语理论和对话理论的讨论反映了其哲学符号学、语言符号学和文学符号学的基本观念, 对世界符号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俄罗斯符号学; 雅各布森; 巴赫金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17) 05-0063-10

0. 引言

我们曾将自皮尔斯和索绪尔相继提出符号学概念之后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发展划分为理论准备期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初)、发展期 (20 世纪初至十月革命前)、成型期 (十月革命至 20 世纪中叶)、过渡期——雅各布森与巴赫金的研究 (20 世纪中叶前后)、成熟期——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至 1993 年) 和后洛特曼时期 (1993 年至今) 等 6 个主要阶段。(王铭玉、陈勇 2004; 陈勇 2016, 2017) 其中, 雅各布森 (P. O. Якобсон) 和巴赫金 (М. М. Бахтин) 的研究属于过渡期研究。一方面, 他们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 两人连同奥波亚兹三巨头^①都是“白银时代”后期应运而生的一代人 (张冰 2017: 27), 分别代表着莫斯科的语言学传统和彼得堡的文学传统, 雅各布森同莫斯科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有直接的亲缘关系, 而巴赫金与俄罗斯形式主义文艺学派有无法割舍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 两人对代表俄罗斯符号学最高成就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均有直接的影响, 例如洛特曼 (Ю. М. Лотман) 偏爱二分法源自雅各布森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 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文学符号学转向则与巴赫金关于法国诗人拉伯雷的研究密切相关。与此同时, 就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关联而言, 两人在学术传统和学理渊源上也是契合的,

收稿日期: 2016-11-03; **作者修订:** 2017-07-30; **本刊修订:** 2017-08-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汉关键评价概念场整合对比研究” (15BYY19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7 批面上资助项目“俄罗斯符号学思想的发展流变” (2015M570050)

作者信息: 陈 勇 (1975-), 男, 湖北天门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北京外国语大学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为语言符号学和语言哲学, E-mail: tonychy@163.com。

对此,张冰(2017: 505)强调指出,“无论西方人出于自己的理解对这笔学术遗产如何进行处理,在俄国当年以至今天,人们似乎从未在‘学统’问题上有过丝毫动摇、犹豫或彷徨,从一开始就坚定地把俄国形式主义(奥波亚兹、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巴赫金学派、罗曼·雅各布逊和布拉格学派当作是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线索”。而且,雅各布森和巴赫金正好处于俄罗斯符号学从成型到成熟、从现代进入当代的过渡时期,在俄罗斯符号学发展史上都扮演着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

1. 雅各布森的研究

在俄罗斯符号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雅各布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一方面是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首任会长,另一方面是彼得堡诗语研究协会(即上文的“奥波亚兹”)的积极分子(他将捷克诗歌与俄罗斯诗歌进行对比的著作是协会出版的第一批专著之一),后来又成为1926年成立的布拉格学派的重要成员,丰富的学术活动及与同时代知名学者的广泛接触和对话为他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布森一方面是俄罗斯国内各个学派之间的纽带,比如“雅各布森在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参与者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原因在于他是学派成员与形式主义者之间活跃的联系环节”(Почепцов 2001: 353);另一方面他也是俄罗斯学界与西方联系的桥梁,如波切普佐夫(Почепцов 2001: 349)就认为:“雅各布森是俄罗斯形式主义者观念与西方之间的联系环节。正是因为他,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的观念才得以进入西方,包括进入法国的结构主义”。事实上,雅各布森的确促进了形式主义学派思想在西方的流行,这不仅归功于他的研究,同时也归功于他的教学,正如列维-斯特劳斯(C. Lévi-Strauss)写道的:“雅各布森用一种无与伦比的艺术阐述自己的新观点,这使得他成为了我有幸聆听过的最耀眼的教授和报告人”(Почепцов 2001: 354-355)。自1952年起,雅各布森经常谈到建立符号学学科并广泛开展符号学研究的必要性,极大地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符号学在苏联、美国以及西欧和中欧的不同国家的发展。雅各布森亲自参加了1965年华沙国际符号学研讨会,也参与了1966年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符号学夏季研修班,表现出了对符号学问题的极大关注和浓厚兴趣。

1.1 符号分类思想

雅各布森对皮尔斯的符号学观念进行了深入思考,致力于解决符号学最现实的问题。他对皮尔斯基于能指与所指的不同关系将符号分为索引符(индексные знаки)、像似符(ико-нические знаки)和象征符(символические знаки)的符号三分法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他指出,象征符(如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约定性联系也存在于另外两种符号中,如写生画以相似性为基础,应属像似符,但将三维物体投射成一幅二维的写生画,这其中是有一些约定性的规律的。作为象征符的语言符号的各个层级中也都存在像似性的成分。由此出发,雅各布森认为,这三类符号并不是各不相同的自主的符号类型,这种分类考虑的只是能指与所指之间起主导作用的不同关系类型。事实上也的确存在过渡型的符号,如象征-像似符、像似-象征符等等。同时,雅各布森考察了“相似性/相关性”“事实的/约定的”这两组二项对立的不同组合,认为皮尔斯的索引符、象征符、像似符分别是事实相关符号、约定性相关符号和事实相似符号,除此之外还应存在约定性相似符号,比如音乐符号。

雅各布森还从符号的生成方式角度将符号分为直接由机体产生的符号(如手势)和借助工具产生的符号(如钢琴曲)。他认为,借助录音机、电话机、收音机等现代技术手段进

行言语信号的传播不会改变言语本身的结构,但这种时间或空间的距离感会对交际双方的关系及话语表达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不能把电影、电视等媒介形式仅仅看作复现现实的技术手段,如电影已经由对各种视觉形象的机械复制发展为一个复杂的自足的符号系统。雅各布森把戏剧表演看成一种特殊的展示,因为戏剧里演员表现剧中角色与商店里陈列的货品代表同类产品二者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把事物本身当作符号。雅各布森在考察索引符号时,强调要区分信息(информация)和交际(коммуникация),因为经常会存在没有发话人的情形。如动物不会故意给猎人留下脚印,但是这些脚印起着能指的作用,使猎人能得出所指,即获得关于动物类型、运动方向和离开时间等方面的信息。这是典型的索引符号,但动物不能被视为发话人,只能作为信息的来源,而交际一定要包含事实上的或假定的发话人和听话人。

雅各布森在考察符号的表达与人体五官间的对应关系时注意到,绝大多数符号都是通过人的视觉或听觉感知的,因此他对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进行了比较:前者的构成一定与空间相联系,由一系列同时性成分构成;而后者由一系列继发性成分构成,其结构因素中总少不了时间(以同时或先后的形式出现)。雅各布森(Якобсон 1985: 323)认为:“像似符号在纯空间、视觉符号中的主导地位 and 象征符号在纯时间、听觉符号中的主导地位使我们有可能弄清与符号系统的划分、随后的符号学分析以及心理学阐释相关的一些原则间的关系。”空间和时间也可以成为符号分类的另外一种依据:空间关系符号和时间关系符号。

1.2 符号学定位思想

伊万诺夫(Иванов 1985: 26)曾经强调:“符号学由对各种符号仅凭印象的研究慢慢变成一门严肃科学,这个转变正是由雅各布森开始的。”可见,雅各布森在符号学学科地位的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于符号学的研究对象,雅各布森(Якобсон 1996: 161)强调:“符号学不仅有权力而且也应该在全部系统这一规模上研究所有类型符号系统的结构,解释它们之间不同的层级关系、功能网络以及普遍性的或区别性的特征。在代码(код)与表述(сообщение)或者在能指(signans)与所指(signatum)之间关系上的区别,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从符号学研究中剔除某些类型符号(比如非任意性符号或者避免了社会化的泥沼而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唯一性的符号)这一恣意妄为的个人企图是对的。符号学正因为是关于符号的科学而理应囊括所有类型的符号(signum)。”

雅各布森从交际的角度来认识符号学、语言学和一般交际科学的关系,认为三者都是研究交际的学科,只是研究对象覆盖的范围不同,这一区别可用一组同心圆来形象地表示:语言学研究借助言语表述进行的交际,位于最内层;符号学研究那些借助表述进行的交际,位于中间;一般交际科学研究任何形式的交际,位于最外层。他认为,符号学关注的符号不能局限于语言这样的纯符号系统,它还应该考察建筑、服装、饮食等应用性符号系统。比如,雅各布森认为,每一幢建筑、每一件服装都是一种表述类型,都表现出不同的符号特征。^②

雅各布森符号学思想的核心概念是结构。1920年,在布拉格接触到索绪尔的著作之后,雅各布森对索绪尔将研究重点不是放在研究对象本身而是放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上而感到非常惊奇。这立刻使他联想起法国画家布拉克(G. Braque)和毕加索(P. Picasso)“不重视事物本身而重视事物之间联系”的创作风格。事实上,在此之前,结构问题就已经成为了雅各布森关注的对象。雅各布森(Якобсон 1996: 181)写道:“新诗学实践、我们时代物理学上的

量子运动以及大约是 1915 年我在莫斯科大学接受的现象学观念指引着我的探索。正是在 1915 年, 后来很快成立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大学生团体决定研究俄罗斯民间文学的语言学结构和诗学结构, ‘结构’这一术语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具有了相关的伴随意义, 尽管战争期间在莫斯科还不知道索绪尔的教程。”结构主义态度是雅各布森从形式主义学派中获取的理论营养, 同时也是他贯彻始终的研究方法, 是他同西方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开展平等对话的基础, 对俄罗斯国内外的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曾回忆道: “毫无疑问, 1941~1942 年在美国与罗曼·雅各布森的会面向我展示了(我想赋予这个词最充分最有力的意义)先是何谓语言学, 然后是何谓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学是这样一门学科, 它当然属于人文科学, 但具有而且那里已经具有的基础与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所能发现的一切处于同一水平。”(Попцов 2001: 348)

1.3 语言符号学理论

雅各布森一直强调符号学中语言学方向的独立地位, 而他对符号学的突出贡献正体现在其语言符号学理论上。

1.3.1 语言中心论

雅各布森认为, 无论从列维-斯特劳斯对社会交际所做的 3 个层次划分^③来说, 还是从儿童的发育^④过程来看, 语言在各种符号体系中都占据中心地位。这种语言中心论的观点事实上与俄罗斯一贯的符号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也影响了洛特曼有关第一模式系统和第二模式系统的观念。在此基础上, 雅各布森(Якобсон 1985: 379)进一步指出: “很明显,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在文化的框架内, 语言是作为其底层结构、基础和万能的手段发挥作用的。”雅各布森反对沃尔夫假说, 认为语言的特点是由其在同文化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 这一点为儿童早期习得语言过程, 以及世界上的语言其语音形式和语法形式根本反映不出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这一事实所证实。

1.3.2 语言通讯理论

依据交际行为的一般模式, 雅各布森提出了与皮尔斯动态意义说相似的语言通讯理论, 认为意义存在于全部交际行为(李静、王永祥 2015: 136), 任何一个语言行为的成立都受制于所指(реферант)、代码(код)、说话者(адресант)、受话者(адресат)、接触(контакт)、表述(сообщение)等 6 个因素, 它们分别对应语言的 6 种功能: 所指功能(референтная функция)、元语言功能(метаязыковая функция)、情感功能(эмо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意动功能(кона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联络功能(фат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诗学功能(поэт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其中, 对诗歌语言和诗学功能的探索成为了雅各布森学术活动的一个中心。雅各布森认为, 符号学最有前景的任务就在于对那些主要指向表述本身, 即完成诗学功能的结构进行对比分析, 倡导研究者对文学、音乐、绘画、芭蕾舞剧、戏剧、电影等各种艺术形式进行平行分析。杨建国(2011: 11)甚至强调: “如果我们把雅各布森的诗学话语看成一个超文本符号系统, 可以说, 雅各布森穷一生之力建立起这一系统去探索语言中的‘诗功能’, 而‘诗功能’反过来也浸透到他所建立的符号系统中, 令其呈现出结构完美, 具有诗歌结构特征的神话体系。”

1.3.3 音位学理论

布拉格学派在区分语音学和音位学的基础上, 其突出贡献在于音位学研究, 认为音位不

是声音本身，而是声音的对比功能。因此，着眼于音位间的对比关系，特鲁别茨柯依（Н. С. Трубецкой）根据与整个对立系统的关系、对立成员之间的关系、区别力量的大小等标准总结出了9种音位对立：双边对立、多边对立、均衡对立、孤立对立、否定对立、分级对立、等价对立、抵销对立、永恒对立。秉承二元对立^⑤的思想，雅各布森进一步将每一个音位特征都归为一个正值（表示某种特征）和一个负值（表示该特征的对立特征），进而将音位特征区分为2大类共12组：一类为音响特征，共有9组：元音性/非元音性、辅音性/非辅音性、聚集性/分散性、紧张性/松弛性、浊音性/清音性、鼻音性/口音性、非延续性/延续性、刺耳性/圆润性、急煞性/非急煞性；另一类为声调特征，共有3组：低沉性/尖锐性、抑扬性/非抑扬性、扬升性/非扬升性。正如周启超（2012：126）所强调的，雅各布森的这种结构主义音位学模型成为了结构主义向诸多学科扩张的基本动力，直接影响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

1.3.4 标记理论

雅各布森另一个具有典型符号学意义的贡献是他发展了布拉格学派同行特鲁别茨柯依提出的标记理论。雅各布森的标记理论起源于音位学研究，上述12组区别性音位特征表现的正是有标记特征和无标记特征的对立。雅各布森指出：“在音位层次上，任何特定对立中有标记项的位置是由音位系统中这个对立与其他对立之间的关系所确定的，换句话说，是由该对立与同时或暂时邻近的区别性特征之间的关系所确定。”（王立非 1991：3）根据特鲁别茨柯依发现的音系学中的不对等规律，雅各布森提出了形态学不对等法则，认为有标记范畴表示明确的肯定特征，无标记范畴则不表明这一特征存在与否。因此他认为，无标记范畴的概括意义要远远大于标记范畴，在一定情况下，非标记项可以中立化，从而代替标记项。在此基础上，雅各布森得以将标记理论应用于词法领域，主要用来分析俄语动词的语法范畴和名词的格范畴。巴蒂斯特拉（E. Battistella）在《标记概念的逻辑》（1996）一书中将雅各布森50余年对标记概念的研究工作归结为5个互相联系的主题：1）意义和语音特性与价值的关系；2）非对称性作为范畴化的一条组织原则所具有的作用；3）语言各个层次之间具有同型性的可能性；4）价值和以价值为依据的变化的可能性；5）在分析符号系统、美学系统、交际系统的信息结构时，标记概念可能发挥的作用。（钱军 2000：153）

1.3.5 极性概念和等值概念

基于索绪尔关于语言具有横向组合和纵向聚合两个结构轴的观点，雅各布森认为所有的信息是由“垂直的”运动和“平面的”运动结合而成的。垂直的运动指的是选择操作，即从语言现有的库中选择具体的词，而平面的运动指的是组合操作，即把词语组合在一块。选择以相似性（一个词或概念同另外的词或概念的相似）为基础，是隐喻式的，组合的过程以邻近性（把一个词置于另一词的旁边）为基础，是换喻式的。与索绪尔自下而上的视角不同，雅各布森认为篇章的生成过程是自上而下的，即聚合操作先于组合操作。

在探讨传统修辞学中的隐喻和换喻这两种修辞方式时，雅各布森提出了两个具有重大普通语言学 and 符号学价值的概念：极性概念和等值概念。极性概念是指语言具有垂直极和平面极两个向度，分别由隐喻和换喻来体现；而等值概念则指隐喻和换喻关涉的新实体与原实体具有同等地位。通过对失语症病人的试验，雅各布森甚至为索绪尔的语言双轴观找到了脑神经方面的证据：失语症病人的语言错乱现象表现为“相似性错乱”和“邻近性错乱”，这两

种错乱分别与隐喻和换喻对应。在此基础上,雅各布森认为隐喻(与聚合相对应)和换喻(与组合相对应)这两个概念甚至可用来解释很多其他符号域现象,比如:诗歌体现的是隐喻模式,而散文体现的则是换喻模式;浪漫主义诗歌中隐喻风格占主导地位,而现实主义文学中换喻风格占主导地位。特伦斯·霍克斯(1987: 77)强调,隐喻和换喻的对立其实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性模式(它的直接的、并存的、垂直的关系)和历时性模式(它的序列的、相继的、线性发展的关系)根本对立的本质。

2. 巴赫金的研究

巴赫金是一位拥有哲学家、符号学家、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等多种头衔的学者,长期蛰伏后被重新发现的俄罗斯思想家,因其对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深远影响而被后者视为师祖。巴赫金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其著作和论文要么当时没有发表,要么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概括地说,巴赫金的符号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哲学符号学、语言符号学和文学符号学3个领域。

2.1 哲学符号学视野下的符号性质

关于符号,巴赫金虽然并没有给出完整的定义,但从多个方面论述了符号的独特性。

其一,符号的物质性。符号的物质性是现代符号学强调的重要方面,巴赫金也不例外。巴赫金(1998a: 350)认为:“任何意识形态的符号不仅是一种反映、一个现实的影子,而且还是这一现实本身的物质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符号现象都有某种物质形式:声音、物理材料、颜色、身体运动等等。”可见,巴赫金强调了符号的物质基础,即以物示物,由此产生意义(胡壮麟2001: 13)。

其二,符号的社会性。巴赫金认为记号系统不只是个别意识现象或个人心理的内在现象,也是社会性的、客观的、在个人意识之外被给予的。(李幼蒸1999: 618)巴赫金指出,符号与社会环境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符号在社会交际中的实现、对任何符号的理解以及符号产生的环境等均是社会的。(王铭玉等2013: 109)可见,社会性是符号发挥功能必不可少的条件。

其三,符号的交际性。与索绪尔突出静态结构系统的符号观不同,巴赫金认为符号的意义和功能体现在社会交际之中,因而也特别强调交际的语境因素,并将这种交际态度扩展到心智生活的所有符号现象中。他认为:“离开了这些社会交际的独特形式就没有长诗或颂歌,没有长篇小说,没有交响乐。”(Медведев 1928: 22)具体到言语体裁,巴赫金也是在言语交际中加以研究的,他认为社会活动领域和交际领域构成了言语体裁不可或缺的要素(王加兴、袁俭伟2015: 39),对话交际是话语的真实存在领域。

其四,符号的意识形态性。巴赫金历来强调符号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认为意识形态与符号相互依存,意识形态领域与符号领域是一致的。巴赫金(1998a: 349)明确指出:“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在它之外存在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巴赫金富有创见地强调,符号研究与他试图创建的意识形态一般科学具有直接联系,所有类型的意识形态活动均是由其符号(双面)特征联结在一起的(Иванов 1973: 5)。巴赫金认为,每一个意识形态创造领域都形成了其他领域不适用的自己特殊的符号和象征。

其五,符号的可解码性。巴赫金认为任何符号体系原则上都是可解码的、可被理解的,

并将人们如何理解符号这一问题归为3种情况：通过熟悉的符号弄清新符号的意义；对符号的理解是在与符号实现的整个环境的密切联系中完成的；内部符号使人们得以感受和理解外部符号，没有内部符号就没有外部符号。在巴赫金看来，符号解码包括4个过程：一是对物理符号（词语、颜色、空间形式）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感知；二是对这一符号（已知的或未知的）的认知，理解符号在语言中复现的（概括的）意义；三是理解符号在语境（靠近的和较远的语境）中的意义；四是能动的对话的理解。这一过程可图式化为：感知→认知（概念意义）→认知（语境意义）→能动的对话。（王铭玉等 2013：111）

其六，符号的元语言性。关于符号在人类思维中的作用问题，巴赫金强调了元语言性概念。巴赫金认为，各种符号体系可解码、可转换的基础正在于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共同逻辑，在于有一个潜在的统一的语言之语言作为共同基础发挥着元语言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元语言构造了诸意识之间的人际关系，服务于人类的认识活动。（王铭玉等 2013：112）显然，符号的这种元语言性是与人类思维、认知的共性特点密切相关的。

2.2 语言符号学视野下的话语理论

在巴赫金的理论体系中，话语不仅仅是他的一个基础性观照对象，也是他打破学科樊篱、填平学科鸿沟的大一统手段，同时也是将其哲学符号学观念与文学符号学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工具，话语理论因而构成了巴赫金语言符号学观念的核心内容。正因如此，张冰（2017：273-274）强调指出：“巴赫金理论的核心和精髓，不是所谓的‘复调’，也不是所谓的‘对话’和‘对话主义’，而是他的话语理论。”巴赫金甚至被普迪斯塔（A. Podestá）尊称为“话语之父”。

巴赫金的话语（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слово）和话语观源于其超语言学思想，他理解的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巴赫金 1998b：239）；“超语言学不是在语言体系中研究语言，也不是在脱离对话交际的‘篇章’中研究语言；它恰恰是在这种对话交际之中，亦即在语言的真实生命之中来研究语言”（巴赫金 1998b：269）。超语言学突破了索绪尔排除交际语境和话语主体、强调规则体系和结构系统的局限，以话语为依托赋予了语言学研究全新的内涵和使命。在巴赫金眼中，话语的存在领域几乎构成了人类生活中的一切，透过话语研究可以将不同学科的探索整合起来。

巴赫金（1998a：357）将话语的全部特征概括为“它的纯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性、生活交际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作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性”。而关于话语与符号的关系，巴赫金认为，作为最纯粹和最巧妙的社会交际手段的话语，也是最纯粹和最典型的符号；同时强调：“话语的整个现实完全消融于它的符号功能之中。话语里没有任何东西与这一功能无关”。（巴赫金 1998a：354）而在诸多符号中，只有话语具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功能：科学的、美学的、道德的、宗教的，“话语伴随和解释着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意识形态创作的所有表现形式、所有其他的非言语符号都由话语原初力所包围，深陷其中，无法完全独立，无法与之脱离”。（Волошинов 1929：21）如同所有其他符号一样，巴赫金也是在社会交际具体形式的语境中研究话语的。

2.3 文学符号学视野下的对话理论

巴赫金是从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式小说和叙事文本的对话性结构而进入文学符号学殿堂的，以复调理论和狂欢化理论为代表的对话主义是他对符号学的重大贡献。

巴赫金在批评将符号学理解为关于符号系统之间关系的科学以及将语言学理解为关于语言之间关系的科学的观念时,第一次谈到了多语现象(многоязычие)在语言意识发展和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任何长篇小说或多或少都是语言形象、风格、与语言不可分割的具体意识的对话系统,长篇小说中的语言不仅是在描绘,而且自身也是描绘的对象。”(Иванов 1973: 28)“小说——是社会各种话语,有时是各种语言的艺术组合,是个性化的多声部。”(董小英 1994: 23)小说中的对话语言是文学的“最强形式”,排除了统一的、绝对主义的独白通讯形式,即排除了个人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而代之以“民族的和社会的语言多重性”(李幼蒸 1999: 631)。正是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分析对多语现象、他人言语、双声部、多声部、一语双声、复调、对话等概念体系的论述汇聚成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巴赫金认为,对话无处不在,独白也是一种内部化的对话。巴赫金认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高潮点即是对话的顶峰(Бахтин 1963: 357);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是彻底的自我意识主体,而他者和对话则是他们实现自我认识的必然条件。

借用源自音乐理论的复调这一概念,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新的话语类型进行了概括。巴赫金认为,对话性贯穿陀氏小说始终,体现了以下几个重要特征:一是“平等性”,即小说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是平等的对话关系;二是“自主意识”,即小说中并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作者的统一意识,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具有独立的“自主意识”,小说正是借此展开情节、人物命运、形象性格,从而展现有相同价值的不同意识的世界;三是“积极性”,即强调小说中主人公的主体性和不同意识世界的平等展现并不意味着作家没有自己的艺术构思和审美理想,事实上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给自己的人物以极大的自由,在其想象的空间内让他们以对话的方式充分表现自己的见解,同时把各种矛盾对立的思想集中置于同一平面上描写,努力营造一种共时性的存在状态,而作者的意识则随时随地都存在于这一小说中,并且时时刻刻具有高度的积极性。(王铭玉等 2013: 114)

巴赫金对话理论是基于个体话语中广泛存在他者与他人话语这一事实,他认为话语具有同时指向言语内容和他人话语的双重指向性,这种双声语的本质是两种意识、两种观点的交锋。巴赫金根据利用他人话语的方式及使用目的的不同,将双声语的语体划分为故事体、讽刺性模拟体、讽拟体、暗辩体等几种类型。除了看到日常生活中人类思想本身存在的对话关系以外,巴赫金针对作者、读者、人物等主体范畴概括出了这样几组对话性关系:人物与人物、人物与自我、作者与人物、作者与读者、人物与读者,并重点将作者与人物的对话关系概括为主人公掌握作者、作者掌握主人公、主人公即作者 3 种类型。至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巴赫金是在走出作者-主人公的对话关系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个例分析,进入一般叙述学层次时才加以特别关注的。按照巴赫金的观点,作者应该充分考虑读者的统觉背景和积极理解,换言之,文本接受者——读者的主体地位是在巴赫金分析普通说者与听者之间往返式的对话指向过程之后才被其认同的。巴赫金认为,托尔斯泰的话语充满着内部对话性(即说者在揣摩听者的特殊视野和独特世界之后,在话语中暗含的表达信息的因素)，“托尔斯泰能敏锐地洞察读者的意义及表达特点”(董小英 1994: 44),其作品的指向是直接向社会开放的,他与之进行论争的各种社会声音在文本中都有其代表人物。

狂欢化现象及狂欢化诗学一直是巴赫金关注的焦点问题。狂欢化概念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狂欢节庆典,狂欢化这一概念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于能够准确地概括社会转型期的文化

特征,尤其适用描写和阐释文化的多元性、平等性和开放性。巴赫金(1998a: 190)强调:“在欧洲文学的发展中,狂欢化一直帮助人们摧毁不同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多种不同风格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一般而言,欧洲小说发展有3条路线:史诗式、修辞学式和狂欢节式(李幼蒸 1999: 626),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将其纳入第三种类型,由此开始其狂欢节诗学研究。狂欢节本质上表现为对所有限制、所有规则、所有等级现象的完全颠覆,将狂欢节的特点引入文学之后形成的狂欢节式文学是对话形式在新的甚至是错乱的时空范畴内的一种表现:压缩情节拓展的时间流程,扭曲情节场景的空间特质,将作者、人物、读者置于全新的时空范畴,使其对话呈现出狂欢化的特点。作为一种文化渗透和文化杂合的产物,狂欢化诗学理论打破了神圣与粗俗、崇高与卑下、伟大与渺小、聪颖与愚钝等之间原有二元对立的界限,使众多难以相容的因素在对立、碰撞、冲突中渗透、交流与对话,达到同时共存、多元共生。(夏忠宪 1994: 80)

3.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俄罗斯符号学界得到世界普遍承认的两位符号学家,雅各布森和巴赫金对俄罗斯符号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俄罗斯符号学与世界符号学的对话和交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雅各布森的符号分类思想、符号学定位思想、语言符号学理论对一般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巴赫金有关符号性质、话语理论和对话理论的讨论反映了其哲学符号学、语言符号学和文学符号学的基本观念,对世界符号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注释:

- ① 奥波亚兹指 1916 年在彼得堡成立的“诗语研究协会”,是该研究会俄文缩写 ОПОЯЗ 的音译,其三巨头指什克洛夫斯基(В. Б. Шкловский)、艾亨鲍姆(Б. М. Эйхенбаум)、特尼亚诺夫(Ю. Н. Тынянов)。
- ② 博加特廖夫(П. Г. Богатырёв)就曾对斯洛伐克的民族服装做过专门研究。此外,一战期间,博加特廖夫曾与雅各布森及同属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雅科夫廖夫(Н. Ф. Яковлев)一起在莫斯科省的一个县完成了对具体社会环境下的语言和民间口头创作的描写工作,并将研究成果写成手稿,可惜手稿丢失。另外,他还与雅各布森一道指出了语言学与民间口头文学的共同特征。
- ③ 列维-斯特劳认为社会交际的实现分以下 3 个层次:表述的交换(обмен сообщениями)、“方便”的交换(обмен удобствами)、女人的交换(обмен женщинами)。
- ④ 对儿童成长过程的研究表明,学会说话的小孩其手势的交际象征意义与不会说话的小孩反射式的身体动作是大相径庭的。
- ⑤ 二元对立是雅各布森终生坚持的研究原则,他甚至不论实体和对象,列出了一个繁杂且缺乏统一标准的二元对立清单:自主/包容、静态/动态、同在/序列、代码/信息、邻近性/类似性、记号实例/值项、形式/实质、语法学/语义学、意义/指称、客体语言/元语言、内部通讯/外部通讯、常量/变量、创生/扩散、个别性/兼容性等。(李幼蒸 1999: 285)

参考文献:

- [1]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二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a.

- [2]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五卷)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b.
- [3] 陈勇. 俄罗斯符号学成型期文化化学方向的研究 [J]. 中国俄语教学, 2016, (3): 58-63.
- [4] 陈勇. 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研究综览 [J]. 外语教学, 2017, (2): 44-49.
- [5] 董小英. 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 [6] 胡壮麟. 走进巴赫金的符号王国 [C] // 王铭玉, 李经纬. 符号学研究.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1: 1-16.
- [7] 李静, 王永祥. 表达的意义与意义的表达——雅柯布森的语符功能观 [J]. 俄罗斯文艺, 2015, (3): 133-139.
- [8] 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9] 钱军. 标记概念: 从雅柯布森到乔姆斯基——评 Battistella 《标记概念的逻辑》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2): 152-155.
- [10] 特伦斯·霍克斯.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11] 王加兴, 袁俭伟. 从言语体裁理论看巴赫金对俄语修辞学的贡献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 (6): 37-43.
- [12] 王立非. 关于标记理论 [J]. 外国语, 1991, (4): 30-34.
- [13] 王铭玉, 陈勇. 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历史流变 [J]. 当代语言学, 2004, (2): 159-168.
- [14] 王铭玉, 等. 现代语言符号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15] 夏忠宪.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4, (4): 74-82.
- [16] 杨建国. 诗学与神话——雅各布森诗学话语的符号学阐释 [J]. 国外文学, 2011, (1): 11-18.
- [17] 张冰. 巴赫金学派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18] 周启超. 当代外国文论: 在跨学科中发育, 在跨文化中旅行——以罗曼·雅各布森文论思想为中心 [J]. 学习与探索, 2012, (3): 124-127.
- [19] Бахтин М. М. 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M].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63.
- [20] Волошинов В. Н. Марксизм и философия языка.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метода в науке о языке [M]. Л.: Прибой, 1929.
- [21] Иванов Вяч. Вс. Значение идей Бахтина о знак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и, диалоге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семиотики. VI.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в честь Михаила Михайловича Бахтина (к 75-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C] // Лотман и др. Труды по знаковым системам. Тарту: Тарту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73: 5-44.
- [22] Иванов Вяч. Вс.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путь Романа Якобсона [C] // Якобсон Р. О.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М.: Прогресс, 1985: 5-29.
- [23] Медведев П. Н. Формальный метод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и.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введение в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ую поэтику [M]. Л.: Прибой, 1928.
- [24] Почепцов Г. Г. Русская семиотика: идеи и методы, персоналии, история [M]. М.: Рефл-бук/Киев: Ваклер, 2001.
- [25] Якобсон Р. О.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M]. М.: Прогресс, 1985.
- [26] Якобсон Р. О. Язык и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е [M]. М.: Гнозис, 1996.

(责任编辑 刘芳亮)